

八十年代中期

中国

的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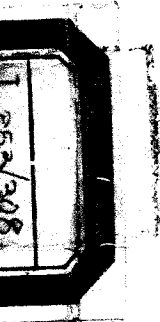
害

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

改 革 卷

中国的要害

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编选



1
版
生



华岳文艺出版社

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

改革卷

中国的要害

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编选

华岳文艺出版社

1154721

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改革卷

中国的要害

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编选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5.75印张 4插页 351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2,000

ISBN7-80549-066-X/I·51

定价: 4.95元

总 序

在1988年到来之际,《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 大选》类编丛书编完了,它是我们三个青年人献给新一年的一份礼物。

近两、三年以来,中国的报告文学再度崛起,推动了世界性纪实文学浪潮的发展,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这些作品充分表现了时代潮流与历史陈迹的碰撞,文明与愚昧的角逐,真理与谬误的较量,反映了各领域、各阶层人民的意向和追求,矛盾和困扰,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它的触角几乎伸及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远及异国他乡,近至我们身边和内心;大至惊天动地的骇人事件,小至每个公民的一颦一笑;上至名人贵要,下至平民百姓……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文学的范畴,闯入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生态学等领域,甚至走在它们的前面。可以说,正是由于报告文学能够迅速、真实地反映现实,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优势,近几年的报告文学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深受

读者青睐。

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我们三人经过艰苦努力，披阅了近三年来的各种报刊，尽量减少遗珠之憾，将质量高的作品拣选出来，然后以社会学的观点，按题材内容分类，成为十个相对集中的专题，再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筛选淘汰，遂成十卷。这样的大型丛书，这样的编选方法，还没有先例，我们也没有经验，还望得到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指点。如果本丛书能为您阅读带来一些方便，且在读后能引起您的一些思考，我们将会由衷高兴。

在本丛书编选过程中，华岳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特别是李贵仁、朱鸿同志给了我们热诚的鼓励和支持。刘宾雁、刘再复、理由、周明、苏晓康、徐刚、白桦等许多作家、批评家和报刊编辑也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1987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告诉你一个秘密·····	刘宾雁 (1)
中国有个唐安华·····	刘宾雁 (33)
洪荒启示录·····	苏晓康 (71)
——洪汝河两岸访灾纪实	
原野在呼唤·····	王兆军 (110)
中国的要害·····	赵 瑜 (141)
人道与天道·····	张开理 (185)
——坎坷的优生之路	
神圣忧思录·····	苏晓康 张 敏 (204)
——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	
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	陈 放 (252)
中国改革的试验区·····	叶永烈 (273)
——“温州模式”	
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	陈冠柏 (296)
金融大地震·····	贾鲁生 鲁 娃 (324)
——记温州地区乐清县的“抬会”事件	
一个“叛逆”农民的十三次状告·····	李树喜 (384)
秦皇兵马俑·····	临 青 (393)
知识的罪与罚·····	郭慎娟 (441)

告诉你一个秘密

——刘宾雁——

进入双鸭山，一个总的印象是平静。现在有了一些相当不错的马路了，有了一些象样的建筑，新建的公共汽车车站，设计得也很好看。还建起了第一座立交桥……人人赞颂王洪图市长的德政。

但是当这一切在三十年历史中迟迟没有出现时，你也看不见人民有什么不满。我们的人民是尊重和信任领导的，也是含蓄而不易外露的。只有收集民谣的人才能多少摸到一点人们的真实心理和感情：“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市听；一条大街两岗楼，一个公园一个猴！”这就是对三十年市政建设的一个不完全的总结，因为垃圾满街、污水横流还都没写进去呢。但是就这，已经和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描绘不大一样了。

但是王洪图市长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平均五百人只有一个厕所，这个市民们必须每天体验一次的困难，一时就解决不了。为了把这个比例削减一半，你算算得修建多少茅坑！何况人的需要也不只这一种呀。去年以市财政收入新建的住宅只有三十套！在一个拥有四十余万人口的城市，这个数字令我吃了一惊。

所以，这个市的公民们，对于市领导的政绩的反应，也不仅仅是编点顺口溜。在我收到的一封双鸭山的来信里，一位公民就说：“不知怎么的，觉着双鸭山的阳光都不如别处暖和。”

这大约不会是由于双鸭山的纬度太高罢。

劣 胜 优 败

双鸭山的地理位置确是有点特别。它位于我国东北三省的东北角，是那个方向上的最末一个城市。从北京去，要换乘两次火车。它看到《人民日报》也要晚上两三天。

“这里太闭塞了，”一位年轻的同志告诉我，“这里的人，你看吧，有点木各章的。”木者，“木然”之意也。

所以，我在这里所写的事，也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我国很多地区是见不到的。

日本出现了一家“无人工厂”，零件的制造、装配和产品质量的检验，一概靠机械和仪器进行。双鸭山呢，它的有些情况，有时会使你产生一个感觉：这儿是不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城市呢？

三江平原上每年生产的粮食，双鸭山是一个集散地。当黑龙江的粮食养不活它的两千多万人口时，一部分外来粮食也在这里储存。这样，粮囤就很多了。但是，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些粮食保管的技术和制度，这里的粮食却常常霉烂变质。几百吨上千吨的玉米楂子，说发霉就发霉了。小麦呢，说发芽就发芽了。没发霉、发芽的粮食呢，又常常在加工车间的水坑里泡着。工程师庞炳权设计的全风动现代化面粉加工厂，被拆来改去弄得乱七八糟，以致出粉率年年亏损，质量也低劣不堪。双

鸭山人爱吃玉米楂子，一个人每月却只能分配到二斤，你以为
是缺货吧？其实大批的楂子正在粮囤里发烧呢。进来的是上好
的小麦，拿到市民餐桌上的，却是又黑又牙碜或者“芽麦”制
成的胶粘胶粘的馒头。双鸭山人吃带霉味和带致癌物质黄曲霉
素的粮食，盖有年矣。

这个城市，发展工业的条件本来很好。头一个，不存在能
源问题，煤矿就在旁边，工厂不必因停电而“开三停四”。再
一个，它是新兴城市，旧工业改造的负担不重。可是地方工业
如何呢？一轻局的厂子大部分是半死不活、摇摇晃晃的，有的
已经黄了，有的眼看没治了。电子工业不行，机械工业也就靠
个平口钳子和手动葫芦。年年亏损。一九八三年上半年工业增
长速度是百分之二，还靠的是社队企业。一位物资局的同志
说：“照这样下去，翻两番得等到哪一年呀？”

“无人管理的城市”？当然不是。主事的人自然是有的。
不过你会觉得这里的主人好象心不在焉，又象是随心所欲，办
事没个章法，甚至象一个乖僻成性的人，故意把事情搞乱，搞
糟，搞垮……

是不是人手不够，顾不过来呢？这几年光是局处级干部就
提拔了五六百人，吃“皇粮”的人不可谓不多了。也许，问题
出在人的素质上？

这里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汇，叫“大白给”，专指那些干什
么都砸锅，废物，白给、免费赠送也没人肯要的人。人家说，
粮食局有个名叫李俊川的，就是个“大白给”。他在油米厂干
过，不行；调到尖山区粮管所，还是啥也干不了；后来叫他去
领导面粉加工厂，又搞的稀里哗啦。没法儿，又弄到工会去担
负领导职务去了。干啥啥不行，官儿还得让他当，那官儿还不

能太小，还得不断往上升。现在李俊川是副局级干部了。

可是你也不要以为“大白给”就没有一技之长。想当年“文化大革命”，把人关起来动肉刑的时候，李俊川可绝对不是个“大白给”。把人捆起来了，脑袋套上麻袋了，几时动手呢？得看李俊川的信号。他若是倒背着手走出去，那就是说：伙计们，可以“进行”了。这时，猫在窗外的指挥者就能听到室内奏出最动人心弦的音乐了。人打完了，不招供，还得来点软的，这时李俊川又进来了。那人头上的麻袋也摘下来了，这回李俊川的表情全然不同了，他赶忙上去慰问，陪着笑脸说：

“这是怎么搞的！只怪大哥我来晚了一步，叫老弟遭罪了！”

“大白给”在另一方面也不“白给”。有个马××，大字不识一斗，在粮食局财务科当科员还不过瘾，提拔到北山粮管所当所长去了。这个粮管所下头有八家粮店，年年都得维修。

马××把这些工程统统包给一个名叫戴宝山的黑包工队队长去干。那姓戴的也大方，一上来就甩给马所长五百元人民币作见面礼。接着，就大干起来。这个包工队是轻装型的，自己啥设备也没有，全用“大白给”的。把盛挂面的箱子拿来当灰槽，连铁锹都得由粮管所“大白给”。一项工程需要多少料、多少工也不列个表，由戴宝山随便要，马××随便给。花两万元就能完成的工程，他要了四万七千多元。八个粮店，也就是把屋顶的瓦串一串，一百元都用不了，那戴宝山他敢要八百五十元！

照这么说，双鸭山就没有能人了吗？怎么老叫“大白给”当家呢？

怎么没有能人！每天看着马××“白给”戴宝山干着急的那个李世宏，就是个能人。他眼睛看着，心里算着，见国家白

花花的银子从姓马的手里往姓戴的口袋里流，心里是急如火燎呀，可是他毫无办法，因为人家马××是粮管所的一把手，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股长，凡事得听人家的。

李世宏若能总结人生的教训，他也就去看那令他激动和忧虑的白花花的银子的流向了。那教训是够惨痛的了。可以说，人世间的幸和痛苦，除了死于非命这一条，他都尝过了。

他是我到双鸭山后最早访问的几位同志之一。看眼睛，他很年轻。然而从他的眼光和表情里可以看到，他在谈话的同时，还克制着某种肉体疼痛的袭击。从尖削的双肩和憔悴的神色看，他似乎未老先衰了。过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灾难和肉体受到的非人残害留下的痕迹。

“文革”起，李世宏属于粮食局的“楼下派”，即各业务科人员的一派；“楼上派”则是政工人员，当时的局、科长大都站在他们一边，组织科科长银海江是幕后操纵者。李世宏不仅精于计划统计业务，还能言善辩，对方驳不倒他；又能书善画，一张讽刺画激怒了对立派，被抓进福利屯粮库整夜整夜地非刑拷打，遍体鳞伤，又不许医治。有的伤口刚刚结痂，便有一个名叫薛才的坏人专门来揭去疮痂，以此取乐。结果，他身上的肌肉和移位的筋粘合到一起，神经断裂，造成终生不治的病痛。他的腿萎缩了，步履艰难，上楼梯和上公共汽车都得爬。成天腰疼。由于神经和血管被破坏，失去正常感觉，炕头热得烫手，他坐上去觉得冰凉。坐骨神经疼痛直到趾骨，性功能已全部丧失。他犯了什么罪呢？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他还有功呢。天下大乱那几年，双鸭山市民口粮的供应一点也没耽误，他李世宏就有一功；而那些年煤矿生产没有停顿，又和粮食始终维持着正常供应是分不开的。他的唯一过错就是性子犟，不

屈服于压力，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了，他还是口口声声喊：“毛主席，我是跟着您革命的呀！”不肯说假话，不肯出卖自己的同志。

李世宏的身体简直可以说是“文革”劫后幸存者的一个标本，对于那场灾害及其制造者的一个活的控诉。这一点，“四人帮”垮台以后坐在局党委书记办公室里的银海江也看得一清二楚，便打定主意“决不能叫这小子翻身！”不仅不能给他平反、向他认错，连“公伤”也不能给他算！

那银海江，则是另一种人的标本。这两种人的分化，得从二十几年前说起。佟有祥，论年纪比李世宏大不了几岁。论政治经历，却称得上是李世宏的长辈了。因为他遭到第一次打击时，是一九五七年。

那时候，佟有祥是粮食局办公室主任，刚刚入党，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反右派斗争中，刚出校门不久的化验员张喜春被打成反革命，原因是他把一批稻米的等级搞错了。佟有祥想不到秉公直言会成为一种罪行，便起来为张喜春辩护说：“我看是重了。他年轻，缺乏经验，技术也不够熟练。其实，按化验员手册来要求，也没错到哪儿去，只不过是早粳与晚粳之别而已。我看不能说是有意破坏。”几句话，把一个预备党员给丢了。他不服，在支部会上行政会上为自己辩护，有什么用？

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嘲弄吧，张喜春被打成反革命，后来又补定一个右派，还因为他有一些“反党言论”。他看不起业务上没能耐的人，给一些干部起了些绰号：“大白薯”，“大黑瞎子”（狗熊），“大白给”。而正是自从他关进监狱那时起，“大白给”却一天比一天吃香了。

佟有祥看不清形势，偏往狭路上走，受处分以后发奋工作，把更多的力量使到钻研业务和技术上去了。“大白给”越排挤他，他干得起越劲，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期间，他创造出一台自动无人售粮机，在全国展览会上得到很高评价。尽管他离右派和反革命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呢（谁知道他档案中是不是写了一条“中右，控制使用”呢），可是已经失去了受表彰和奖励的资格，于是“技术能手”的称号就只能叫粮食局一位副局长给“代理”了。佟有祥偏偏不计较这些，心里还乐滋滋的。别人提级，不给他提，他也不在乎，还不肯改邪归“政”，仍使劲儿攻业务。其后二十多年他命运不济，只怪他执迷不悟，另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谁让你不走呢！

粮食局的两颗明星，就是从一九五七年那个值得纪念的夏天冉冉升起来的。几年前还是个搬运工人的银海江，那时是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他亲密战友的段连喜，那时候就是他的助手。就在段连喜天天晚上哼着小调儿给一个又一个“右派分子”写定性材料的时候，实践中的政治学和人学发展起来了。银海江就是这一学派的专家。

他的眼睛同时看着你的左边和右边，你会以为他没有看你，其实他始终注视着你呢，就是你不在场的时候，他也在琢磨着你呢。十几年来粮食局换了几任局长和党委书记？唯有他银海江牢牢地留在这里，并且稳步上升。这就因为他是个思维型人物，少言寡语，走路低个头，老是在思索、研究和总结着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心里的道道儿就这么层出不穷。

银海江是颇有“才气”的。他从不自己出面整人。明明整了你，还能让你感激他。表面看去，他确象个古朴厚道，又很有修养的老干部。随着他在政治学和人学方面逐步走向成熟，他

能够使一任又一任粮食局长不得不离开那个岗位；能够使科长们逐渐都成为或换上自己的心腹；能够使党员们在会上讲的话和私下说的话全然两样；能够使几个月的整党试点根本触动不着、甚至不了解他多年经营的那个体系。

那佟有祥呢，一九五七年以后政治上却老不成熟。不看风朝哪边吹，不想舵该怎么使。除了“白专”以外，当四周一片喜歌时，还常唱反调，说粮食工作有这个缺点、那个问题的，看不见领导人不悦的脸色，不懂得不当“驯服工具”的可怕下场……

一九六六年，第二次浪潮到来了。

这时候，银海江已经是掌管人事大权的粮食局组织科科长，段连喜是保卫科干事。九年来，他们积累了不少政治斗争经验，现在，大显身手的历史良机到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银海江为代表的那股力量同以佟有祥和李世宏为代表的力量之间，优劣高低就看得很明显了。“楼上派”把夺权步骤都研究妥当了，佟有祥和李世宏还在琢磨：到底什么人才算走资派呢？粮食局该不该夺权呢？

“楼上派”已经把干部和粮库工人组织成一支杀伤力极强的队伍，准备好囚室和刑具，训练好一批打手了；“楼下派”还在忙于粮食的调配、加工和运输、供应，用一点业余时间写几张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准备辩论会的发言稿呢……

十七年以后，我望着坐在我对面的佟有祥，听他叙述自己的生平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他生就一副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仍然显得有几分天真。当他说“李世宏为人正派，精通业务，又勤奋刻苦，一个人能顶他们十个”的时候，我心想：你佟有祥何尝不也是以一当十呢！然

而你们却天然地斗不过银海江们和段连喜们。这是为什么呢？

银海江式的人物同佟有祥式人物之间的竞技，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即使把一方掌权而另一方无权这一点抛开不论，也仍然是不平等的竞技，因为对方完全不遵守竞赛规则。踢足球他动手，打篮球他便脚；你同他个人决斗，他的同伙从一旁放冷枪，这怎么取胜得了呢？

不祥的“体系”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人为它修史。未来的双鸭山市的史官将会有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记载和研究那些有代表性人物的功过和兴衰史。

关心群众，敢说敢干因而人望甚高的葛亚副市长，还有王杰是怎么死的？那些没有死的，又为什么挂个虚职闲着不干事呢？老干部武兴田，双鸭山党的第一个支部书记，长期主持过市委宣传工作，德才兼备，人还不老嘛，怎么就硬是不用呢？朱传斌，原副市长，可以说是双鸭山唯一一个懂工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非逼他回山东老家不可呢？人们很留恋他呢。

取代他们的又是什么人呢？第一书记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在“三忠于”高潮中曾全身挂满像章——从脖子到脚，身前身后全挂满，足有几公斤重的有色金属。关于那位姓刘的书记，人们的议论多一些了，因为他上得太快，又说不出哪一件值得称颂的政绩。

老的也不是一概不用，要看你的表现，看你是不是跟人家一条心，会不会碍事。比如，那位“文革”前主持过公安工作、后来带头“砸烂公检法”的钟某人，就是个信得过的人。老公

安、侦察专家文更新，就不行了。头一个，他是“文革”受罪最重的，感情就不一样。所以他要求到公安局当个顾问，不行，要求“哪怕就让我破破案呢”，也不行。问题正是在于他过分热衷于那个工作，既能干，又认真，这就不是一家人了。

都说双鸭山人排外，那可不见得。那个鼎鼎大名的造反派冯天，不就是打伊春市来双鸭山避难的吗？一来就当副市长，还把“市委常委”的身份也跟介绍信一起转来了呢。这位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在市民的记忆中留下的唯一政绩，就是澡塘子工程。他发现市民洗澡难是个问题，决定拆掉原来的平房浴池，盖个二层楼。这当然很好。投资四十万元，建呀建的，建完一层，工程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建筑材料都拿去建私房了。于是，双鸭山人只能依旧在一个平房浴池里洗澡，只不过新浴池每平方米造价比原先那个平房高出十来倍罢了。

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摆布着人们的命运，凡是妨碍或威胁这个“体系”的安全和发展的人都被这只巨手无情地推开、按倒甚至扼杀了。

慕润泽在建国时就是个区委书记，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他倒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了。他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精通业务，又坚持正确意见不改，这就威胁了不懂业务的局长；二是不会请客、送礼，不会拍马，不会说假话，这就难以博得上司的好感。这四个“不”，带来了另四个“不”：不给安排固定职务，不提拔，不长工资，不分配住房。这乃是势在必然，因为你若是让慕润泽得势，他一旦有了发言权，有朝一日你就得承认现在双鸭山面粉厂十个月损失六百五十吨面粉是由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你就得承认，当年白花几十万元修建200型榨油厂后来又扒掉，也是拒绝了他的主张的结果。总之，

你就得承认自己无能和有罪，那还得了！

有趣的是在一项工程上糟蹋了国家几十万元钱的冯天始终比曾经阻止国家损失几百万元的慕润泽处于优势。号称“冯大常委”的副市长冯天找他谈话，说：“老慕，你知道，我们俩都是外地人，怕吃不开。咱们得抱个团儿。你放心，跟着我好好干，我决亏不了你！服务局那个局长和书记都不行，我叫你去，就可以提成个局级了。”慕润泽一窍不通，不肯入伙。

“冯大常委”就通知粮食局和人事局：“不能给他安排工作，不能给他长工资！”慕润泽后来调到外贸局，冯天的指示又转到外贸局，这时又增添了一个内容：“不能给他分配房子！”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能有这么大！不是说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吗？就象咱们在日用语言里一样，在生活中，“领导”和“领导人”也是通用的。

舅舅当局长的时候，可以拉扯外甥，让他从税务所里一个小小科员上升为商业局副局长。等外甥成了市委书记，再回过头帮助舅舅。有来有往——我给你儿子弄个支书，你给我女儿一个科长。群众在气愤中说的话，难免偏激，所以应该打点折扣，然而这些话却往往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家里的狗要是会讲话，也当上科长了！”至于一般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干活不由东（家），累死也无功”嘛，你得会看眼色，会巴结，会昧着良心顺着说话，还要有所发现（善于感知领导有何需求）和有所创造（使领导家里增添点什么物质，领导心里增添点什么快乐）。你一旦上去了，又可以回过头来享受你原先奉献上去的那一套物质和精神财富。

血缘关系对于这个体系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五十年代咱们不是繁殖了很多后代吗？到七十年代，纷纷成亲了。双鸭